读城

运河正年轻

韩书运

大运河开通后，两岸集镇如春笋破土，城市崛起。商贾云集，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安邦治国的文臣武将相卿大儒鹊鸣鹤舞，文人骚客巫医百工怀长技绝活者脱颖而出。

开河纳水，水兴舟楫，舟楫载人载物，运河“运”的功用便活跃起来。沧州建州1500多年，地处偏隅，土地盐碱贫瘠，物产不丰，人畜不旺，几迁治所，最后倚运河开衙建府。运河之利，福泽之地，官府客栈，酒肆茶楼，寺庙牌坊，商铺民居，四面物产汇聚，八方商旅云集，晚钟敲夜雨，渔火映晨曦，清晰显现出风华商埠端倪。运河成了沧州的母亲河。

大运河之水，清波微澜，日夜北上，水中船舫上下穿梭，最热闹的是漕运码头。舳舻相接蔽水，帆樯林立映天，装卸工身背肩扛，脚踏颤颤跳板，你呼我唤，一条大船刚刚离岸，几条小船又蜂拥靠岸而来。岸上百货堆积，大车小辆，人推马拉，出入仓廒一派忙乱。

母亲之功在于对子女的生育、养育、教育。运河与大江大河相比身材有些弱小纤细。可她力挽狂澜，使如脱缰野马咆哮的长江黄河等五大水系东西流向，有了南北融通；又使长城内外的文化有了互补式的交流，为养育子女储备乳汁。

中国幅员辽阔，在长期文化基因的传承与沉淀中形成了巨大文化差异。北方之地山浑、土厚、水深，气候寒冷干燥，天空高旷凄凉，景色壮丽，长城以北，植物贫乏，黄沙大漠，大雪弓刀。人物性情多厚重、强悍、豪爽、热情，喜欢吃馍喝烈性高粱酒。南方之地，水流纵横，山色清润翠华，植被茂密，气候温暖湿润，云霞低垂，烟雨缥缈。人物性情多细腻、柔婉、浪漫、精明，喜欢吃米慢饮疏淡黄酒。鲁迅曾说：北人优点是厚重，南人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敝在愚，机灵之敝在狡。

地域文化的形成，有其深厚的地理历史因素。运河终端的北京，元明清以来就是天子脚下首善之区。这里的有些人被称为“京油子”。京城里聚集着皇亲国戚、王公大臣，人际关系盘根错节，非常复杂。在京城混事的人说话时必然要小心谨慎，左右逢源，八面玲珑，腾挪闪躲，恐担干系。日积月累，形成了一种人格和文化现象。沿运河到天津，“卫嘴子”名声在外。借漕运和海运之利，天津成了北方最大商埠，商业的发达催生了大批经纪人（牙行），凭借熟悉行情和三寸不烂之舌，促成了大批生意成交，谓之会说；客来八方，带来各地的特色美食，也出现了烹饪达人和美食家，食不厌精，两只蟹钳能对付几两直沽老酒，早晨一碗三鲜小馄饨那叫地道，谓之会吃；市井相遇，三句话不和，脸色突变，“津骂”脱口而出，然后是一顿节奏感很强的数落，谓之会骂。这些有点调侃。天津是北方曲艺胜地，是相声、天津快板的发祥地，西河大鼓、京东大鼓等说唱艺术都兴盛于天津这个老戏窝子，的确出了很多曲艺名嘴。

沿运河进入齐鲁大地。这是北方保留传统风尚最多的一块土地。儒家文化发源于齐鲁，正脉在济宁，早期大儒孔子、孟子、子思、曾参、颜回、子路、子贡、孔融等都是济宁人。无疑，只有适合营造儒家思想氛围的人文地理环境，这一切才有可能发生。齐鲁的缔造者是姜子牙和周公，他们都是具有传奇色彩的良相，受其影响，齐鲁大地贤相辈出：管仲、晏婴、诸葛亮、王猛、王导、房玄龄等。

运河流经千里，流域广阔，各地都有独特文化传承。这是一条神奇的河流，不但是经济动脉，更是文化交融的河流。明代大学者张岱，绍兴人，以他的博学写了一部百科全书《夜航船》，旨在传播推进中国文化。他说他在长途苦旅中坐得最多的是夜航船。绍兴余姚有这样的风俗，年轻人没有不读书的，到二十岁还没有取得成就得改行学手艺。所以，所有工艺制造这样的低贱行业中，全部熟透了《性理》，这些人非常有学问，简直是两只脚的书橱。坐在船里的时光缓慢无聊，只有闲谈消遣，历史漫长，文物章典繁复，谈资甚多，这些人谈论起来引经据典，船中成了文化赛场。张岱感慨：“天下学问，惟夜航船中最难对付”。一个船舱之内的文化交流尚难对付，更何况大运河流淌千年，东西交流，南北融通，官员、商旅、百业技师、江湖艺妓……互为大师，互为学子，相互启发，相互促进，这才是推动文化与文明融合发展的大手笔。传说中有一个古老乐器叫“和”，它发出的声调能协调任何乐器发出的声调，使之和谐悦耳。大运河不就是文化交流融合中的那个“和”吗？

北方文化像一座高山，崇高、庄严、敦厚、朴实、壮阔；南方文化像一江春水，灵秀、细腻、柔情、飘逸、梦幻。南北文化融合交流就像英俊伟岸的大丈夫和温柔美丽的巧女人组成了一个完美家庭。沧州文化与文明就是这个家庭中产生的骄子。

自元以后，沧州在运河的桨声水影中繁荣了几百年。吸纳各地文化元素，逐渐形成独特文化与民族风情。这个时期运河两岸出现了几个标志性建筑，南川楼、朗吟楼、献县单桥和泊头清真寺，沧州文化进入繁荣时期。涌现出的代表人物灿若星辰。明代双天官王翱、抗倭将军刘焘、清代大学士纪晓岚、中兴之臣张之洞、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北洋临时大总统冯国璋，还有在运河边兴济镇出生的民国将军冯玉祥。沧州人将中华武术的武德和武艺彰显得淋漓尽致，“镖不喊沧”是武林同行对沧州人的敬重，是对沧州武林高超武艺的认可，是煌煌赫赫沧州武林威风。昆仑之巅站立着侠肝义胆的王正谊，东方擂台站立着洗尽民族屈辱的精武霍元甲，他们背后是沧州人的尚武精神。杂技表演大师孙福友被誉为“世界现代马戏之父”，吴桥杂技能够走向世界，就是有了一代代，一批批孙福友这样的绝技高手。近代大医张锡纯，将中西医汇通，中医学界泰斗；荀慧生开京剧国粹新脉，唱一代旦角新声。杜建新先生评价沧州文化现象用了简单八个字“道兼文武，术通天下”，既无过誉之嫌，亦无缺失之处。

岁月悠悠，上世纪沧州境内运河断流。河床长满野草，河坡上种着庄稼，牧羊人赶着羊群，似在荒芜废弃的野地里悠闲行走。是母亲老了吗，老态龙钟，洗尽铅华，不再有昔日风姿？市区内南川楼、朗吟楼、清风楼早已坍塌，不见了踪影，一片荒凉寂静，再也看不到桨声水影，听不见船工号子。母亲体力不支，失去了“运”的力量。

运河儿女不会坐视母亲河静静老去，不愿看她风雨中苍凉的身影，不忍听她老迈孤苦的叹息。母亲最怕的是孤独，最缺的是慰藉。到了我们反哺运河的时候了。南川楼、朗吟楼、清风楼重新立于运河两岸，比前世原物更加雄伟壮丽。运河两岸，修复古迹名胜，建设园林，保护好运河体魄，靓丽运河容颜，铸就运河精神。赋予了运河凝聚力量，传播运河文化、观光旅游的新使命。

美人不老，再现新姿，千年运河正年轻。

温故

耍把戏

惠军明

小时候，故乡常有走村串巷的吴桥艺人表演杂耍，我们称之为“耍把戏”。一阵阵嘹亮的锣声响起，有好事的村民便会奔走相告：“村南或村北来了‘耍把戏’的，没事儿快去看热闹啊！”我们小孩子们听到有耍把戏的，更是欢呼雀跃，蹦跳着撒欢乱跑。争先恐后来到场地，见人头攒动，乡民们早已将场地围成个圆圈。那些“耍把戏”的演员们匆匆忙碌，准备着家伙物件，即将粉墨登场。

看看村民到得差不多了，把戏团便出来一人抱拳来个开场白：“各位父老乡亲兄弟姐妹，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今日我们初到贵宝地，望各位好朋友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先谢过大家啦！”说完一通客套话，表演正式开始了。

各个“耍把戏”的表演内容不一样，有的表演杂技，有的表演魔术，有的表演武术，有的专门耍猴，有的表演曲艺，有的兼而有之。

传统杂技表演很受欢迎，表演者多为年轻后生和妙龄女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民族服饰，动作矫健，身手利落。杂技传统节目很多，如“蹬坛子”“晃盘子”“踢花毽”“顶瓷碗”“叠罗汉”“钻彩圈”“拿大顶”“走钢丝”“攀高竿”等。其中“顶瓷碗”令人印象深刻。“顶瓷碗”有时是一人表演，有时是两三人配合。看似弱小的女演员头部顶一摞瓷碗，表演劈叉、金鸡独立、倒立等技巧动作。她们腰身灵活，动作娴熟，瓷碗如同固定在头上，极其平稳。不仅如此，有时两个演员同时表演，互相将瓷碗踢到对方头顶的碗上。瓷碗一个一个增加，难度也一分一分增加，观众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当最后一个碗被成功接住后，围观的乡民掌声热烈，叫好声此起彼伏。当然“顶瓷碗”表演也常常失败。有时艺人一不小心，头上一两个碗会掉下来摔个粉碎，引得乡民一片惊呼声。

很多“耍把戏”的都有魔术表演，艺人们的表演常常将村民的情绪带到高潮。魔术中“空手变物”最常见。一名戴礼帽的艺人赤手出场，走来走去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旁边桌上的道具也很简单，一根细细的魔棒、一块方帕、一个托盘。艺人借助简单道具，魔棒一挥，掀起方帕，托盘里会出现糖果、鲜花、水杯、活鱼、鸽子等等各种各样的东西。还有的艺人表演“口吐彩带”。剪碎的彩纸被吞进肚里，一条细长的彩带从嘴里拽出来，连绵不绝好似永远也拽不完。一根变两根，两根变四根，无数的彩带从嘴里出来，扔得表演场满地都是。但有的魔术则带有神秘色彩，极具视觉冲击力，如“咽铁球”“吞宝剑”“吃玻璃”“口内纫针”“喷火吐烟”等。“咽铁球”表演时，数个乒乓球般大的铁球被表演者吞入腹中，后又被一一吐出来，让人不可思议。“吞宝剑”表演更令人骇然。表演者将一把长长的宝剑一点一点吞入口中，直至剑柄为止，为增加真实感和喜剧效果，小半截剑竟然从艺人屁股露出来。不清楚艺人们是如何做到的，但表演惊心动魄，乡民爆发出海啸般的叫好声。

街头“耍把戏”武术表演也很常见。有的表演武术拳法和十八般兵器，其拳脚有力，棍棒生风，刀剑闪亮，对打有趣；有的则表演对人的感官极富刺激的硬气功，像“头碎酒瓶”“棍棒击头”“单掌砍石”“单指凿砖”“喉顶枪尖”“胸口碎大石”等。这些“雷人”的把戏都颇具危险性，表演者都经过多年的苦练。例如“喉顶枪尖”表演，锋利红缨枪枪尖抵住喉咙，艺人运气呼喊，死命往前顶再往前顶，直至红缨枪被弯成圆弧形。此表演让人提心吊胆，感觉艺人一不小心便会喉破身亡。

“耍把戏”常见的还有“耍猴”。耍猴人一手拿着鞭子，一手拿着食物，对着几只猴子发号施令。猴子惧怕耍猴人的淫威，不得已做着各种滑稽动作。表演得好，耍猴人便会奖赏食物；表演得不好，耍猴人的皮鞭就会抽在猴子身上。“耍猴”表演小孩们最喜欢，猴子的调皮动作宛若人类，惹得大家开怀大笑。但也常见一些猴子不服管教，它们上蹿下跳，对着耍猴人龇牙咧嘴，有时还扑向耍猴人，搞得他尴尬极了。

“耍把戏”表演完毕，就会有人拿着箩盘，殷勤向村民鞠躬讨要赏钱。善良大方的村民会慷慨解囊，吝啬小气的便假装有事，逃之夭夭。有时“耍把戏”的辛辛苦苦表演一回，也讨要不了多少钱。把戏团无可奈何，为了生存糊口，只好像乞讨一样，挨家挨户敲门讨要钱粮，其中的心酸令人感叹唏嘘！街头的“耍把戏”曾经是许多人养家糊口的无奈之举，但它以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客观上调剂了乡村贫乏的文化生活，丰富慰藉了乡民的精神世界。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街头“耍把戏”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留给我们的各种画面，却永远定格在记忆里，令人难以忘怀！

典故

三龙斗五虎

白世国

沧州自古武风炽烈，讲究御辱有志士，国难无叛逆，但偶或也会发生争锋斗勇事件，酿成惨剧。清末民初，沧州西南的两个村庄发生械斗，轰动一时。

运河西岸某村李家广有产业，妻子焦氏精通拳脚，开把式房。五个儿子功夫高强，称“李家五虎”。

焦氏的女儿嫁到河东赵家不久，老三乘坐渡船过河看望姐姐，河里有凌板漂流。老三穿绸裹缎，细腰乍臂，英俊帅气，在粗布衣衫的百姓里十分扎眼。

有个青年目光落到老三的鞋子上，咂咂嘴说：“嘿，这双鞋可真好看。”老三穿的是双矮帮、薄底的缎面洒鞋，一看就是习武人。

老三感觉他阴阳怪气，就挺起胸脯睨视青年，神情不屑。青年不示弱：“可惜了，穿这双鞋该去追兔子。”两人发生口角，差点动手，被大家拉开。

老三气呼呼到姐姐家，放下礼物，饭也没吃就走。询问摆渡人得知青年是姐夫村的，也姓赵。

焦氏闻讯十分恼怒：“闺女嫁到河东，赵家人竟然当众恶语伤人，得让他知道李家人不好惹。”焦氏召集徒众，携带武器，乘几辆骡马大车奔渡口而来。第一辆大车拉锣鼓，边走边敲打，引得沿途数百人看热闹。

艄公是河东的，得知是打架的，泊了渡船。李家过河不成，在河堤上敲锣打鼓，辱骂河东，隔河约战。

河东素有习武之风，但畏惧焦氏声威不敢应战。全村老小被骂得灰头土脸，暗自生气。

当地的杨乡绅一直劝解李家，李家说再骂一会儿，河东不应声就打道回府。

事有凑巧，河东有个姓王的武师，绰号“草上飞”，在南京开武馆。他恰好回乡，尚未进村就听到对岸锣鼓喧嚣，人声鼎沸，但大家都不敢跟他说缘故。草上飞在家闲聊一会儿，提着鸟笼子去河堤，两个堂兄弟王二爷、王四爷跟了过去。他们三人的功夫出自大马庄武状元家族，并称“王家三龙”。

李家发现对岸河堤有人，骂得更凶了。

草上飞问清事情经过，火气上来了，吩咐道：“给我拿铜锤去，咱会会五虎。”

草上飞提着铜锤施展轻功，踩着漂流的凌板飞速过河。王二爷拎长枪，王四爷执长刀紧跟其后。王四爷功夫稍差，快上岸时掉进冰水里。恶仗难以避免，河东的人呼喊艄公，纷纷过河助战。

双方在河堤打起来，三节棍、长矛、双钩、大刀等各种兵器飞舞，百姓都看呆了。河东的人少处于下风。王四爷鞋湿，打斗中脚下一滑摔倒了，对方挺长枪朝王四爷的肚子刺过来，草上飞眼疾手快，拧身一锤打在对方后背上。这人被打伤了脊椎，自此成了罗锅。

河东的一青年使双刀对阵虎头双钩，被钩破头皮，鲜血淌了一脸，对手不依不饶。草上飞吼了一声：“动真功夫，打死人我偿命。”

三龙斗五虎，双方都下了死手。厮杀中，王四爷挥刀砍掉李家人的一条胳膊……

紧急关头，杨乡绅劝焦氏：“这仗不能再打了，再打得出人命，归官吧。”在杨乡绅的极力阻拦下，双方罢战。

李家伤重。官家调节结果：各治各伤，如果百日内李家人去世，河东要出人抵命。如果百日内李家伤者没死，河东出钱请戏班子唱三天戏。百日外各不负责，不许再起纷争。

河东提心吊胆100天，所幸无噩耗传来，搭台唱戏，事情了结。意想不到的是七天后，李家断臂者伤发而亡，因为有官家的约定，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李家女儿回娘家，一去不归。

百年前的这场纠纷因言语而起，引发武力争斗，杀伤人命，结下冤仇，教训深刻。如果双方少些刚强，多些理智，应该能避免悲剧的发生，人们该从中汲取教训。

相依（国画） 陈墨 作

评论

挚情·诗意·哲理

——吴相艳散文集《行走的目光》序

张继合

《行走的目光》这部作品积淀丰厚、色彩纷呈，突显了优雅、清新、敏感与渊博的文学魅力。这种创作状态，当然值得祝贺了。其实，不同人群往往都揣着艳羡之心、远超之意。吴相艳在文学时空里，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崭新的艺术舞台，已悄然洞开。

植根文学，无法逾越两件事：求艺之心、耕读之味。先说求艺。一离不开踏实，二绕不开天分。

孔子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显然，“生而知之”堪称大师级人物，吴相艳当属“学而知之”了。她酷爱文学，醉心写作，这是一种难以预设、不能遗传的特殊资质。她月下灯前，广读勤耕，印证了阅读与写作都是“力气活儿”。

1070年，宋代名家欧阳修选择了退休。除了“书万卷，琴一张，棋一盘，酒一壶”之外，未求其他待遇。当时，他的文化造诣与艺术主张得到了尹洙、梅尧臣与苏舜钦等人的广泛追捧，作为文坛领袖，他介于“生而知之”与“学而知之”的特殊时空。

老舍先生笑谈：“我爱写作，可就是得挨饿。”“卖文章也是自食其力，不是什么坏事……卖了力气，拼了命，结果还卖不出钱来。越穷便越牢骚，越自苦，越咬牙，不久，怎样？不幸短命死矣！穷而后工，咱没见过；穷而后死，比比皆是。”

原来，吴相艳躲在书斋里，任性地翻阅、全心地精读、

劳累地记录、潜心地对照、深浅地感悟、自我否定地提高……这当然是件苦差事。正像她“白山黑水”的童年、“运河枣林”的少年与“古牛之城”的青年那样，反倒印证了柏拉图那句话：“诗人写诗，不是凭智慧，而是凭灵感。”灵感，与自学尊师有关，又重在“此外”了。

中国诗文同源，吴相艳的确把个人理想，根植在“挨饿”的圈子里。她在《落叶书签》中自况：“每一枚落叶都有情怀。打开发黄的日记，抚摸那些落叶书签，笃信，一枚落叶的飘零并非结束，而是刚刚开始。”嗜读恋笔，离不开老舍先生的“苦”，最要紧的反倒是“苦”之外的天意人心。天意，指求艺者与文化之间的缘分；人心，特指爱的资质、爱的深度与勤劳之外的福分，类似柏拉图“凭灵感”的概括。其实，欧阳修的“书琴棋酒”，没有一件是轻而易举的小玩意儿，始终牵扯着世事起伏与千古文章。

吴相艳《向土地匍匐》坦言：“以匍匐的卑微，是恋，是与土地的生死为一。”文化的借鉴顿悟与浅耕深读，犹如“生死为一”的土地。一，靠自己；二，凭机遇。所谓机遇，正是勤奋之外的天赋。吴相艳伏案深耕，早深植文化，痴情相托了。

《行走的目光》涉猎广泛，涵盖丰富，按照诗词意境分五大章节。世俗生活与文中情怀，网罗在与众不同的“目光”里。行走，指自然时空，穿越的，却是隔朝隔代的世间万物与画意诗情。如陶渊明所说：“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

首先，吴相艳清纯敏感，善于捕捉；其次，她诗意通达，笔落至情；再次，她披沙沥金，妙语惊人。环环相扣的细节，

难以导演，更无法速成，不得不仰仗后天勤奋与先天情缘了。《行走的目光》涵盖着亲情故里、老宅旧城、乡间花果以及地方曲艺等。每一丝情怀都贯穿着前朝旧事与诗词歌赋……无疑，这是一种纵横古今、情达血脉的博大胸怀，也是史哲融汇、借古喻今的文笔革新。作者以自我为焦点，观照古今，文史并进，的确颇具眼力、更显功力、独具魅力的笔墨时空。她酷似女作家张爱玲，拥有洞察一切的双眼，不仅喜好漂亮衣服，更偏爱隐藏在背后的五彩文化与精神生活。

吴相艳长于东北，成于冀中。红高粱与黄小米筋骨相连。她培植的文学根脉，犹如萧红搀扶孙犁，彼此神会，清谈笑望。吴相艳的文化坐标，确实性情酣畅，情意盎然。难怪艾青先生坦言：“假如诗人只有浮泛的感情就进行写作，人们也不会满足的。”吴相艳的文思与文笔，恰恰跋涉在“浮泛感情”的小路上。

再说兴趣。一俗中见雅，二雅中蕴俗。

这是一种颠扑不破的规律：文学可爱，却难以把握。悟，是一个层次；勤，属另外一个。它们存在因果，却无必然关系。歌德先生说：“诗人的本领，正在于他有足够的智慧，能从惯见的平凡事物中，呈现出引人入胜的一个侧面。”显然，惯见的平凡事物容易搜罗；足够的智慧，却是你看你的、我看我的。

第一步，俗中见雅，属于品位与内涵大不相同的筛选过程。犹如“荷花淀派”“山药蛋派”的关系，或俗或雅，雅俗兼备吧。第二步，雅中蕴俗，类似昆曲与流行歌舞，理应俗得恰如其分，直抵人心。阅读，躲不开日积月累；写作，扔不掉草径学步。吴相艳概括出一种生活方式：“只言幸福不言伤。”诗词歌赋，你当然爱得，却强迫不得，既包括个人声望，又囊括隔代品格。对每位追随者而言，能否探寻到游刃有余的出路，或因有缘，或凭巧合。除了消化古今中外、垂青铜铭竹简之外，几乎没有第二条路让人“生而知之”、大势早成。

通读《行走的目光》暗藏三种心愿：首先，文笔再厚重、渊博一些。其次，“小我”再进化、充沛一些。再次，把“大俗”“大雅”化为“大我”，这才是吴相艳独有的宝马快刀。从挚情起步，到诗意徜徉，再到哲理驻足吧。

新著亮相，很醒目；接下来，好戏连台，日夜图新吧。

每个人的追求过程，不避功利，或可淡薄，只要痴心不改，疾缓由人。至于收获多少、反馈薄厚，谁也拿捏不准。类似郁达夫先生那句话：“作家是三分之一天生，三分之一学得，三分之一由时代以及社会环境造成的。”这才是文学掩埋的难关呢。